

中国人民大学 刘永谋◎著

知识无涉权力的传统观点，

今天已经不合时宜。

知识的权力研究是业已兴起的群体主义知识论最重要的主题，

包括一开始就相互交织而如今开始融合的

马克思、知识社会学、尼采／福柯和技治／反技治等四大传统。

行动中的密涅瓦

——当代认知活动的权力之维



中国当代学术文丛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2007）

中国人民大学 刘永谋◎著

行动中的密涅瓦

——当代认知活动的权力之维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行动中的密涅瓦：当代认知活动的权力之维 / 刘永
谋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43-3454-3

I . ①行… II . ①刘… III . ①权力 - 研究 IV .
①C9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4375 号

Xingdongzhong de Miniewa
Dangdai Renzhi Huodong de Quanlizhiwei

行动中的密涅瓦

——当代认知活动的权力之维

刘永谋 著

责任 编辑	郭发仔
封 面 设 计	严春艳
出 版 发 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 行 部 电 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cb.com
印 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 mm × 240 mm
印 张	17.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454-3
定 价	3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谨以此书

献给我入学术之途的恩师和
师母！

前　言

在现代西方主流观念中，知识被视为是与权力无关的。而按照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学”与“仕”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同时融贯、致力或游走于两者之间的是对士大夫的一项规范要求。这似乎蕴含着某种可尝试性称之为“儒家技治主义”的观念。对于中国人而言，知识的权力无涉（power-free）论才令人诧异。

实际上，现代之前的西方并非一直坚持知识的权力无涉论。在古希腊哲学源头上，真、善、美大体是统一的。无涉论的兴起归功于现代知识论即认识论的流行，尤其是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分离，到实证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无涉论达到了顶峰——当然是以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无涉论的形式。逻辑实证主义否认科学的功利主义传统，而把科学意义标准纯粹系于追求真理的理性主义传统。实际上，否认功利动机对科学兴起的贡献，毫无疑问是罔顾科学史实——逻辑实证主义恰好以逻辑排斥历史。而对于技术知识，逻辑实证主义避而不谈，大概实在无法否认技术出身于工匠传统。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一体化，把科学与科学应用分开的观念遭到广泛质疑。以原子弹爆炸为隐喻性标志，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明显暴露出来，科学最终能解决科学所导致的问题的观念遭到广泛质疑。随着反战运动、绿色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以及新一轮殖民地解放运动等的兴起，科学技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成为战争、统治、殖民和性别歧视支持者的一面被相关理论研究揭示出来，科学技术作为纯粹革命力量的观念遭到广泛质疑。尤其是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之后，再将知识视为权力无涉的，已经不合时宜。仅就科学哲学而言，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实际是另类科学哲学的基本研究线索和主要研究内容之一。^①

^① 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认识论是一种主体分析学，即建基于主体认识结构、特征、能力和限制等分析基础之上的知识论研究。19世纪末，随着解释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以及尼采哲学的兴起，认识论的主体分析进路逐渐松动。可以说，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认识论的兴盛，是认识论的回光返照。之后，知识论研究的历史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等新进路出现，认识论传统开始崩溃、变形或被替代。自此，当代知识论进入了群体分析学的新阶段，即建基于不可还原为主体的异质性群体之限定性条件分析基础之上的知识论研究。

仅就科学论而言，自“标准科学哲学”出现之后，科学论经历了反思自然科学的基本立场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转变。逻辑实证主义以为科学的合理性辩护为己任；历史主义将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从逻辑转移到历史中，实质上削弱了辩护的力度；另类科学哲学则完全转向了对科学合理性的批判。科学大战之后，经过对科学正反双方的认真反思，科学论中出现了一种更为客观、审慎和具体的审度立场。在新科学哲学看来，知识既不是权力无涉的，亦不完全等同于权力，两者的关系应该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分析。

黑格尔云：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智慧要历经磨难才会致，但这并不代表着会让知识缄默。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之时，世界必定亦正在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的权力研究兴起，如上所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

在哲学史上，知识与权力均为历久弥新的问题。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千家百派莫衷一是。我们不打算对这两个概念做徒劳无益的梳理，而直接对这两个概念持一种最宽泛的理解。知识从来就不是为藏诸名山而出现的，而权力亦不能完全从铁幕、压制、血腥、强力等黑暗面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概括着“言”的方面，权力概括着“行”的方面，而既有的知识的权力研究主要从哲学层面上反思人类“言”“行”之间的勾连。

显然，即使定位在哲学层面上，知识的权力研究所包括的领域、所涉及的问题亦过于宏阔、庞杂，极难把握。若以一己之力，光是勾勒全貌，只怕要耗尽毕生精力。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思想史上曾以不同的视角和问题出现，而自培根之后，应该说从未真正远离过



人们的视线，亦有人将其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城邦政治交给理性和智者的理想。因此，若不将议论限定于现代，根本没有办法限定问题的应答域。并且，知识的权力研究如何可能只是纯粹哲学的？当知识、权力被非常宽泛地理解，知识的权力研究直接就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诸多学科的研究。因此，只能选择以西方的哲学反思为主体对象，但又不以学科划分为芥蒂。

总的来说，现代知识的权力研究可以分为 4 个主要传统：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和技治－反技治传统。当然，四大传统一开始就相互交织，到 21 世纪之交，更是有相互融合的明显倾向。本书并没有细致地描绘四大传统产生、流变和汇合的完整图画，而是挑选其中相对更重要的关键点或典型代表进行勾勒，说明它们的基本旨趣、线索和立场，并按照大致的历史顺序编排，极力赋予研究以思想史的基本形态。虽然尽力阐明了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线索，但研究总体上无疑是不太完整的。因此，不得不承认，本书所催生的问题很可能会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但提出问题非常重要，故而本书并非毫无必要。

本书的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了思想史与问题学、形上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张力与困惑之中。也许，知识的权力研究更应该成为一门问题学，即围绕现实问题情境展开的跨学科实证分析，而不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形上层面的纯粹思想史反思。实际上，我们亦主张，就知识的权力研究的未来而言，问题学应该被更多地关注，譬如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研究。不过问题学研究开始之前，没有思想史的梳理、辨析和借鉴，问题学将会沦为毫无方向的资料汇编、数据分析或政策论证。

本书的第 1 章“导论”勾勒了知识的权力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即主体分析学向群体分析学的转向，进而概括了知识的权力研究的传统、问题和趋势。第 2 章讨论了马克思的机器哲学思想，并与后来者凡勃伦的机器哲学思想进行比较，以说明机器哲学革命理想的失落。第 3 章以凡勃伦的“技术人员的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s）为例，勾勒了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主要源流、理想框架以及平行的反技治主义的发展。第 4 章分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被知识社会学修正的线索：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将它修正为意识形态分析，



而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那里直接就成为一种没有任何乌托邦色彩的利益博弈学说。第5章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将批判的触角扩展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第6章审视了今天被广为传播的福柯知识-权力理论，他的知识-权力理论不仅与尼采，而且与马克思、知识社会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第7章以波兹曼为例，描绘了人文主义反技治主义者的基本立场。第8章所分析的芬伯格，是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最新的继承人。而第9章所阐述的劳斯思想，既是分析哲学的反叛者，亦是知识社会学的支持者，更是福柯知识-权力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移植者。第10章涉及知识社会学在21世纪之交的最新分支，即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STPP）研究，它的主旨实际上赋予公众或人民以权力。更重要的是，STPP正在整合知识的权力研究中所有异质性的理论资源。第11章算是STPP研究的一个案例，即物联网技术极权倾向的分析，亦是对网络的技治主义应用的某种批评。

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者的工作必然有前后相继的一贯脉络。由此看来，作者之前的福柯哲学研究以及与刘大椿先生合作的另类科学哲学研究是本研究的前期准备，而作者正在展开的当代美国另类科学哲学研究、技治主义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又将是本书的专题深化。因此，本书可算作作者研究工作的阶段小结。

本书从学界的前辈、同仁的意见和观点中获益良多，感激不尽。承蒙“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0902）的资助，本研究得以顺利完成。承蒙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编辑老师辛勤劳动，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著者浅陋，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永谋 谨识

2013年春于北京大西洋新城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群体分析学与知识的权力研究（1）

- 一、群体主义知识论的兴起（4）
- 二、知识的权力研究鸟瞰（15）

第 2 章 机器与阶级境遇：马克思与凡勃伦的观点（31）

- 一、马克思的观点（34）
- 二、凡勃伦的观点（40）
- 三、马克思及其后的机器批判（46）

第 3 章 论技治主义（51）

- 一、技治主义的源流（53）
- 二、技治主义的框架：以凡勃伦为例（57）
- 三、对技治主义的批评（63）
- 四、技治主义的“真理城邦”（67）

第 4 章 意识形态批判：从马克思、曼海姆到 SSK（73）

-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76）
- 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79）
- 三、曼海姆与科学知识社会学（83）
- 四、批判、分析与“学术闲逛”（88）



第 5 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 (93)

- 一、科学成为统治工具 (96)
- 二、技术理性的总体化控制 (100)
- 三、“隐形意识形态” (104)
- 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 (109)

第 6 章 福柯的知识 - 权力理论 (113)

- 一、从微观处审视知识 - 权力 (116)
- 二、知识在真理制度中争斗 (120)
- 三、知识 - 权力奴役现代人 (123)
- 四、通往解放之路 (127)

第 7 章 反技治主义者波兹曼 (135)

- 一、社会信息二级控制模式 (137)
- 二、官僚主义的技术统治 (146)
- 三、技术无神论的对策 (152)
- 四、人文精英主义的反技治主义 (155)

第 8 章 芬伯格：技术中的权力斗争与社会主义 (161)

- 一、技术设计是权力斗争的过程 (164)
- 二、走向社会主义：重构文明与技术 (172)
- 三、非决定论与现代性、技治主义批判 (184)

第 9 章 劳斯：实验室与权力规训 (195)

- 一、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 (197)
- 二、实验室权力模式及其扩散 (206)
- 三、科学的跨学科文化研究 (213)
- 四、劳斯的定位与创新 (218)

第 10 章 以赋权为目标的 STPP 研究 (223)

- 一、从 SS、SSK 到 STPP (226)
- 二、STPP 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230)
- 三、STPP 研究的内容与问题 (233)
- 四、STPP 研究的成果与展望 (235)

第 11 章 民主与极权：物联网的偏好与风险 (239)

- 一、圆形监狱的概念、机制与隐喻 (242)
- 二、物联网的界定、发展与愿景 (245)
- 三、从圆形监狱看物联网 (248)
- 四、作为极权工具的物联网 (250)
- 五、补充：从无标度网络模型看物联网 (253)

主要参考文献 (260)

**提
要**

认识论建基于主体分析学之上。经过福柯、哈贝马斯和罗蒂等人对主体分析学的批判，知识论开始从认识论一极主导进入泛化增生和多元并存的新阶段，以群体分析学取代主体分析学是其中最重要的新方向，知识的权力研究因而兴起。粗略地看，知识的权力研究可以划分为四大传统：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和技治－反技治传统。目前它包含异常复杂的问题网络，未来它应转向审度知识的基本立场。本章阐述了全书的基本立场、分析框架，亦给出了知识的权力研究的“知识地图”。

第1章 导论：群体分析学与 知识的权力研究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主线之一。它源自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泰阿泰德问题^①，即如何从各种意见（doxa）中区别出知识（episteme），可谓源远流长又蔚为大观。在笛卡尔之后，知识论以认识论的形式占据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泰半江山。实际上，认识论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批评。随着实证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科学认识论再一次把认识论推向高峰。

20世纪下半叶，对认识论的否定性意见逐渐被广泛接受，建基于主体分析学基础上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知识论从认识论一极主导进入泛化增生和多元并存的新阶段：知识论中的主体分析学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式微、变形或裂变。同时，围绕着主体分析学批判出现了诸多知识论的新形式，这些形式均挣脱了主体分析学的桎梏。譬如，作为认识论“余晖”的科学哲学亦日益走向泛化、发散的“战国时代”，至少出现三种并存的可能思路：philosophy of science，即对科技一体化之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theory of knowledge，即对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其他知识类型的所有知识的哲学研究；philosophy from science，即从科学知识出发对现时代的全面哲学审视。^②

在目前知识论异常丰富甚至有些杂乱的现状中，群体分析学取代主体分析学成为知识论的基础，是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论的社会学化、历史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均坚持群体分析学的进路，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渗透和融合，很难说知识论未来是否又会从多极重回一极。但无论如何，群体分析学都将在知识论的未来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知识的权力分析是群体分析学最重要的线索，亦是目前群体主义知识论最重要的成果。

① 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讨论了知识的本性是什么，知识与智慧、正确意见有什么区别。他没有给出知识的确切定义，只是谈到什么不是知识。知识既不是感觉，又不是真实的意见，也不是包含理性解释的真实看法。泰阿泰德对此表示困惑和绝望。后世常把知识论的问题称为泰阿泰德问题。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49-753。

② 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86。



一、群体主义知识论的兴起

(一) 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主体分析学

知识论是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而认识论是对主体认识本性的哲学研究。在笛卡尔之后，认识论成为现代知识论的最主要形态，亦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与正确意见有什么本质区别？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如何运用其认知能力获得知识？那么，认识论如何能够回答知识论问题？答曰：通过一番问题转换。显然，知识论的成立必须预先认定知识与意见的本质区别，正如苏格拉图所声称的：“但是我敢肯定的是，说正确意见和知识有区别并非仅仅是一种猜测。我可以声称自己几乎不知道什么东西，但在意见和知识的问题上，我至少可以说这一点我是知道的，除此之外我还能说自己知道什么呢？”^①后来，苏格拉底的区分对于多数人意味着：知识具有客观性、真理性。然而，对知识本性的类似回答并不能保证人能把握知识，更不能保证人能自己获得真理。而认识论的成立已经预先认定：人有能力获得可靠的知识。换言之，人的认知能力保证了真理从各种意见中现身，因此，知识本性系于人的认识本性，于是研究认识本性的认识论将解答泰阿泰德问题，知识论因而转变成认识论。

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将认识真理的理性能力视为人的本质，人因而成为与被认识的客体世界相对的主体。作为对知识论的一种具体形式，认识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坚持主—客二分的基本立场，把知识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成果。既然主体的认识本性保证了知识本性，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研究主体的认识本性，具体地说如主体的认识条件、结构、能力、特点和限制等，它们决定了主体知识的根源、界限和性质等。因此，可以将主体的认识本性研究称为主体分析学，它是现代认识论的基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哲学家注意到主体分析学对于认识论的根本性意义。在福柯看来，包括认识论在内的现代哲学均为“迷信主体的

①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33。



哲学”^①。现代哲学赋予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主体成为哲学反思的原点：现代哲学反思既从主体出发又最终指向主体。福柯用“人类学沉睡”来描述现代哲学的主体迷信。他指出：“我所谓的人类学是指哲学特有的某种结构，它决定了目前的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处于某一特定的范围内，即人类的局限性。”^②因此，他用限定性分析来指称主体分析学，和海德格尔一样把人视为有限性的存在。哈贝马斯则将主体分析学称为“认识批判”(die Erkenntniskritik)，即通过分析主体认识条件来回答“怎样才能获得可靠的认识”这一近代认识论之唯一核心问题。^③他将认识批判视为认识论思想史的基本线索。认识批判亦被哈贝马斯称为“自我反思”，即为获得可靠认识为目的而反思主体或人本身，因而认识论被他视为“人的科学”。罗蒂则将主体分析称为“心”的形上研究。他视“心”(mind)为“自然之镜”。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他在多处写下诸如“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的观念”“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灵”等短语。他认为，传统哲学把人的“心”看成一个巨大的镜子，它能够映照自然之物，没有“心”则语言、思想和科学理论无处可立，即心是最直接的“自然之镜”。因此，认识论将知识基础问题等同于“心”的形上研究，“去发现这些基础，就是去发现有关心的什么东西，反之亦然”^④。在“心”——“自然之镜”的“隐喻丛”中，人是“镜式本质”的，即以“心”或认识本性为人之本质；传统哲学尤其认识论是“镜喻哲学”，即以“心”为基础的哲学。在“镜喻哲学”中，知识就是“心”对自然的准确再现或表象。因此，罗蒂实际上将主体分析学等同于精确表象学。

认识论围绕主体分析学展开，但知识论并不必定以主体分析学作为基础。在现代之前，西方哲学史上对知识本性的探讨并不都是奠基于认识主体之上的。比如，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知识不是美德的基础，而是相反，因而知识的根基不在于人的认识本性而在于其德性。经院哲学坚持“知识即信仰”，因而知识本性系于上帝。奥古斯丁认为：“谁

^① 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0。

^② [法]福柯：《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69。

^③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

^④ [美]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



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①这光就是“上帝之光”：只有信仰才能获得真理，获得知识。因此，知识论可以不是认识论。苏格拉底和奥古斯丁不是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下讨论知识问题的，并没有把知识本性研究转变为认识本性研究。他们的知识论表明：认识论对知识的本性研究指向真之维度，但知识论研究还可以指向善、美或神之维度；认识论建基于主体分析学，但知识论还可以建基于非认识主体甚至非主体的基础之上。

认识论不等于知识论，而是知识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在于它将知识根植于作为认识者的主体的基础上。但是，由于认识论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兴盛，人是主体即认识者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样一来，知识被视为人的认识产物而不是诸如“天启”的结果，人的本性也就在于被认定为认识本性，主体和认识论相互支持，极力掩盖对知识本性研究的其他可能。因此，自康德之后，知识论几乎被等同于认识论。

（二）批判主体分析学

主体分析学围绕主体展开，必须要澄清主体范畴问题。但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中，主体只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作为现代西方哲学根本性范畴的主体、人性、理性与认识实际上是相互循环解释的——人的本性是认识本性，这使得人成为主体，亦使认识论成为可能；理性是人的认知能力，保证人能独立获得真理，亦保证人成为主体；主体是人的本性，意味着人要通过认识把握客体，亦意味着人具备客体所没有的理性……这些范畴最终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永远不能澄清的神秘基础。譬如理性，正如汉金斯所言：“‘理性’可以表示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指强加于不羁的大自然的秩序，可以指常识（如合理性这个术语表示的那样），它还可以指逻辑上有效的论证，就像数学中的论证那样。”^②因此，试图用理性来澄清主体、人性、认识，并不

① 奥古斯丁：《忏悔录》//苗力田：《西方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8。

② [美]托马斯·L.汉金斯：《科学与启蒙运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

